

悼念大学服务中心

Carsten A. HOLZ (穆嘉)

八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听说大学服务中心（USC），到中国去交流的海外学生对它赞不绝口。寒假期间我去香港旅行，特意去了香港中文大学（CUHK），想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心在中大图书馆的地下一层，门上有一个不起眼的标志，我花了点时间才找到。而这里所见令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我将再来，专程而至。

再次来到是 1994 年，我那时在康奈尔大学写我的经济学博士论文。我的导师 Thomas P. Lyons 看着我一天到晚琢磨那些商业周期模型，但一无所获，于是让我去研究点实际的东西，写写论文中国的那一部分。他将我打发去香港，并给 USC 的助理主任熊景明，Jean Hung，写了一封推荐信。我在 USC 的一个小书房里安顿下来后，再也不想离开了。

那时，所有中国研究领域的人都会路经 USC，有欧洲人、北美人、香港人和大陆人。资深学者坐在高高堆起的书籍后面，翻阅藏在中心的罕有资料，令我肃然起敬。在 USC 的几个月里，我遇到的中国学者比后来几年之中遇到的还要多，他们中不少与我是同一代人。有的后来成为老朋友，有的即便多年未曾交谈，一旦见面就有谈不完的话，有几位失去了联络。

周六下午变得轻松愉快，USC 的人同向郊野行。熊景明召集她的队伍，中心主任关信基教授用他的七座位驾座，把我们拉到香港不同的郊野公园。如此漫步可是一件需要专心致志的事情，众人不停地聊呵聊，聊呵聊。熊景明不时打断大家的谈话，大呼小叫：“看看这些花”，或者指着周围的美景让我们停下来，尽心欣赏，喘口气。人群于是自自然然地重新组合，或三两成群，或小团队，再继续前行。讨论中国研究的新动态，各种想法在交谈中形成，当然也交换关于中国学者的八卦。那些新加入 USC 的人在此上了一个速成班，在知识上迅速约会（除此而外，也有人在此接下良缘）。

午餐可是大事件，说的不是食物。往往一周举办至少一次午餐研讨会。其他日子里，到了中午，熊景明会在中心兜一圈，邀约大家一道去大学餐厅用餐（今天想起员工食堂的麻辣豆腐，我还会流口水）。她往往把新来的人交托给原来 USC 访客，说你们应该互相谈谈，刚认识的人通常就一道去午餐。午餐时间的谈话总是新鲜有趣，令人觉得时间不够。

住宿是一个大问题。中大的雅礼宾馆对博士生来说太贵了，而 USC 的访问学者在校内没有任何地方可住。熊景明因此充当了一个人的住宿代理，她总相信最终会找到适合的地方。记得我在研究生宿舍里当过“蛇”（非法住在一个暂时不在的中大的研究生的房间里），在火车站旁边的一栋楼里和十几个大陆学生合租（和其中两个人合租一个房间），幸而我们所有人的工作时间不同，还在中大后面的村子里向一位老太太租了一个小房间。有一次，我在某个地方住满期限，早上提着行李箱来到 USC，不知道当晚可以睡在哪里。当天下午，熊景明替我找到新的住处，给了我新的地址。（隐约记得，我曾在 USC 研究室地板上睡一晚）。

对我们这一代在 USC 的中国学者来说，熊景明是它的核心：她对中心馆藏了如指掌，她知道与你的研究相关的远近人物。对如何安排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生活，她也是专家。她曾经帮助我度过经济难关（我急待的电汇延误，她私人借给我一笔款）。她如何能够令 USC 的馆藏保持稳定的增长，找到新资料，收集到那些让人惊诧的图书资料，始终是一个谜。你可以在这里东看看，西看看，窥见一斑；只有当你看到足够的馆藏资料，才意识到通盘的运作，管理多渠道的图书供应链，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需要非凡的技巧。

我于 1995 年秋天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后，会定期去 USC，在大量中央和地方统计年鉴中查找统计数据。我尽量把时间安排在星期六的上午，然后参加下午的行山。我也会派研究助理去 USC 复印所需的数据。到 USC 去一趟，得穿越九龙新界，换乘四种之多的交通工具，越来越令人感觉吃力，也的确累人。（用经济学家的话说，访问中心的机会成本随着教学和出版的压力而增加）。

但 USC 仍然是一个家。中心秘书郭少玉结婚时，我们都去参加她在半山的举行的婚礼。我认识所有 USC 的工作人员，每次回到中心，见到那些看着我成长的人，总是很高兴（Carsten 的父母从德国来香港看望他时，他邀请中心所有的员工去家里做客。我们就像是他在香港的亲友——译者注）。

国家统计局开始建立在线数据库后，我以前在 USC 收集的许多数据可以在互联网上轻易获得。那时候，应该是 2000 年中期左右，我去 USC 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仍然会收到午餐研讨会的邀请，但越来越多的演讲者来自大陆，他们研究农村问题（不是我的兴趣所在），用中文演讲（普通话还好，如果带有浓厚口音，例如四川话，我就不大听得懂了）。国际访问学者似乎在减少，就对 USC 的访问和利用而言，我的研究生时代和与今天研究生已经是今非昔比。

中心举办一年一度的研究生研讨班，还举办 USC 成立 40 周年的庆典。2009 年，关教授和熊景明编辑了一本（中文）专著《中外著名学者论 21 世纪的中国》，我贡献了一个章节。到了 2010 年代初，我常年在海外工作，对 USC 的访问减少到每年一次，这时我和其他许多海外学者一样，会在 USC 花上数日，狂印以后可利用的材料。就我对中国研究的了解，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图书馆都无法与 USC 相提并论，根本无从比较。

中国研究领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的开放，有可能直接从大陆获取研究资料，乃至进行调查，收集数据，也可以在大陆地方图书馆做档案研究，或者获取官方数据。海外中国图书馆的重要性逐渐减弱（至少在我的学科，经济学）。研究方法也从历史描述性研究发展到数学模型、计量经济学和调查。国家统计局在网上公布了许多数据，并在清华大学开办了一个数据中心，为学者提供具体需求服务。包括中国数据在内的商业数据库应运而生，例如 CDMNext 的中国高级数据库，以及 Wind 数据库。

看来，USC 无法与这些资金雄厚的国家和商业组织竞争。虽然 USC 开始收集数据库，但它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资金（或劳动力），无法超越大陆和西方商业世界越来越多的产品。尽管如此，在线数据库不会解释官方数据的修订而更新，数据库系列一下出现，一下消失，要长期跟踪评估几乎不可能（档案资料则可以让入追踪正在发生的事情）。尽管如此，在中国进行的调查，通常得与大陆学者合作，最终需要听从党对此类调查的限制。这意味着，虽然直到几年前在中国大陆进行研究已经容易得多，对 USC 的需求也可能减少，但我们使用的数据和提出的问题却越来越受到中共的影响。要想仔细检查数据、质疑研究本身的话，可供操作的范围缩小。

我最后一次密集使用 USC 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当时我需要利用县级年鉴及分类市级年鉴来获得县级数据。USC 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地方，让我可以去书架上找到需要的东西。（因为 USC 馆藏的分类系统）在同一个书架上，还可以找到更多另外感兴趣的材料。

2017 年后，我顾不上 USC 的事了，一方面个人原因，不再感到安稳，主要因为香港的事，当地下起火时，很难坐在象牙塔的上层，专注于中国经济学的一个狭窄的研究课题。我不明白中大图书馆并吞中心对中国研究意味着什么。访问将被限制到什么程度？目前，作为香港永久居民和另一所香港大学的教授，我已经不能自由进入中大校园访问 USC。某些以前可以公开获取的资料，有多少多会消失在地窖里？即使使用的机会不变，全世界的中国学者在多大程度上会觉得他们还有一个可以聚集的地方？它现在只是一堆书（及各种材料），而不再是一个中国研究的中心、一个超越图书馆的学术机构。

(熊景明译)